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:
yzhy83@163.com

李立三,一个工运领袖的跌宕人生

余意明

株洲是一块红色文化的热土,在革命年代,这里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,而李立三是共产党内著名的工运领袖,也是株洲唯一曾做过过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革命家,他的一生充满了跌宕起伏。

慷慨激昂的工运领袖

李立三颇有才华,性格外露,慷慨激昂,很有组织能力。

1899年,李立三出身于醴陵一个破落地主家庭,做过一年的小学教员,后投入护国军,任连队文书,在送信的时候结识了湖南护国军总司令程潜,程对他十分欣赏,1919年资助他到北京读书。

在北京的李立三,看到新思潮萌芽,便回家筹措旅费,准备留法勤工俭学。在法国,李立三积极因参加工运、学潮而被法国政府驱逐,1921年底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,陈独秀派他去安源领导工运。

李立三是一把搞工运的好手。他在刘少奇的协助下,领导了安源路工人大罢工,并取得了胜利,但随即被反动派通缉,1923年去武汉,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。1924年去上海,任中共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。李立三后来说,他本名李隆郅,1924年11月与邓中夏去吴淞的火车上,邓中夏觉得他的名字工人不容易认识,刚好看见三个人立在火车站口,邓中夏就说叫立三吧,自此以后就改为李立三。到上海后,李立三参与领导三次工人起义,被推为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,遭奉系军阀追捕,1925年10月赴莫斯科。

1926年,李立三回国,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,任总工会组织部长。1927年,他领导收回汉口英租界,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,任中央工人部长。6月,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,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和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。7月,中共中央成立临时政治局,李立三为5名常委之一。

提出并参与领导南昌起义

大革命失败后,李立三在江西九江与谭平山、邓中夏研究当地军事政治形势后,向中共中央建议组织南昌起义。南昌起义中李立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、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政治保卫处处长,南昌起义失败后,部队撤至潮汕突围后赴上海。1927年,中共“八七会议”改选,李立三与毛泽东等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。广州起义失败后,张太雷牺牲,李立三接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。

1928年6月,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,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选为总书记,李立三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候补委员,担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。1930年6月,李立三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、宣传部长。

“立三路线”的背后

中共六大以后名义上总书记是向忠发,但实际上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李立三。

此时是李立三一生中最高峰时期。大革命失败后,中共处于低谷,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后,工运蓬勃发展,红军和根据地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。

李立三由此产生一个错觉,以为革命高潮来临,1930年6月,提出实施“会师武汉、饮马长江”的冒险进攻计划,中国革命由此遭到重大损失。

1930年9月,共产国际派赖秋白、周恩来回国,取代了李立三。改选中央政治局,李立三从中央政治局常委降为政治局委员,随后王明从共产国际回国,又取代了赖秋白。因此,李立三的冒险错误实际持续的时间只有3个月。

回过头看,李立三的错误实际上是对形势估计不足。因蒋介石当时把主要精力放在军阀之间的内战上,间接地给共产党革命腾出了更大的发展空间,而李立三以为是敌人不行了。蒋介石在解决军阀内斗之后便集中对付共产党,红军损失惨重。

据当事人回忆,最初是没有什么“立三路线”这个说法的。但对莫斯科出身的“洋学生”来说,上纲上线是他们的拿手好戏。王明一回国便给李立三扣上了一顶“立三路线”的帽子。王明的做法,实际上是以左的思想、左的办法,去解决左的问题。

不过,与王明、张国焘不一样的是,李立三的个人人格比他俩高,犯了错误,便坦荡承认,毫不推诿。

“立三路线”这顶帽子如同魔咒,李立三从此一生陷入检讨与被批判。从1930年开始在苏联被批判15年,两次坐班房差点被害死。1946年,李立三回国,在1949年2月的中共七届“二中全会”、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,他都深刻检讨自己的历史错误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李立三本来靠边站了,造反派要求他交代刘少奇的罪行,他不肯出卖自己的灵魂,因而受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,被诬为“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”、“里通外国分子”,受到残暴斗争,1967年被迫害致死。1980年3月,中央召开追悼会为他平反昭雪。



李立三。来自网络

一个攸县青年诗人与鲁迅的交往

陈浩望

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里,保存有两份六十多年前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组织的“诗歌社”编辑出版的《诗歌》创刊号。里边有一首题为《进行曲》的长诗,叙述两个青年农民,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剥削下,穷困,无路可走,只得离乡背井,走出了家乡。《进行曲》的最后一句是“走出桥头镇就会天明。”

“桥头镇”并非一个镇,而是攸县的一个乡村地名,也就是今天的攸县绿田镇五星村上新屋组,而这首诗的署名则为蔡斐君。

一个攸县青年的新诗,是如何出现在鲁迅博物馆的呢?这其中,还有段颇有意味的故事。

去国万里的青年诗人

蔡斐君又叫蔡健,1914年1月18日生于桥头屋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,是著名美学家蔡仪的胞弟。他从小就喜欢阅读家藏的新文学书刊,培养了对新文学的最初兴趣。

在攸县和长沙上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后,蔡健于1933年去日本留学,先读预科,后升入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文学部学习。留学生中不乏诗歌爱好者,蔡健也是其中的一员。他们凭着自己的激情和诗艺,办起了《诗歌》。这是他们发表作品、进行诗歌理论探索的阵地。

当时,流行着一种口号诗。在某些诗人的笔下,诗不是由于它的思想意义发挥战斗作用,而是借助于满纸口号。蔡健想,诗与口号是不是应该有区别呢?同时,又在不少人的笔下,诗写得与散文差不多,而又不是鲁迅先生的《野草》那种散文诗,它既没有诗的节奏,也没有诗的情思。蔡健想:诗与散文是应该有区别的。作为一个正在试着写诗的艺术爱好者,到底走什么道路呢?蔡健对这个问题不够明确,有些苦恼。他希望求得指引,但是,当时没有人能作出正确的解答。

正当蔡健就诗歌的创造和发展道路问题认真探索的时候,蔡健家道中落,家里无法继续供他留学的学费,他不得不回国。

1935年暑假,蔡健由日本回到了上海。他的好友杨慧修到码头上去迎接他。杨见他带着两大箱书籍回来,惊讶的问:“怎么,你打算回转过去了吗?”“经济困难,读不下去了啊!”

这时的蔡健沉浸在重重苦恼中,民族的灾难,个人的前途,以及艺术探索中方向不明的种种问题,像落在茫茫黑夜的孤苦行人,需要寻找指路的明灯。这时,年轻的蔡健想起了常给青年指导的鲁迅先生。

跟鲁迅探讨新诗

蔡健从杨慧修处探得了鲁迅先生转信的地方,在上海客栈给鲁迅寄去了一封信,就“诗与口号”、“诗与散文”是不是有区别这两个问题,向鲁迅先生请教,并谈了些

个人看法。不久,就收到了鲁迅先生的回信:

“斐君先生:八月十一日信,顷已收到,前一回也收到的……我对于诗,一向未曾研究过,实在不能说些什么。我以为随便乱谈,是很不好的。但这回所说的两个问题,我以为先生的主张,和我的意见并不两样。这些意见,也曾零零杂杂的发表过。其实,口号是口号,诗是诗。如果用进去还是好诗,用亦可,倘生坏诗,即和用不用都无关。譬如文学与宣传,原不过说:凡有文学,都是宣传,因为其中总不免传布着什么,但后来却有人解为文字必须故意做成宣传文字的样子了。诗必用口号,其误正等。诗须有形式,要易记、易懂、易唱、动听。但格式不要太大,要有韵,但不必依旧诗韵,只要顺口就好。”

信的前一部分,精辟地回答了“诗与口号”的关系问题。

后一部分,精辟地回答了“诗与散文”的关系问题。

蔡健收到鲁迅的信后,非常激动,终生难以忘怀。此后一直到1936年鲁迅先生逝世前,蔡健和鲁迅还通过好几封信,其间蔡健寄过几次诗请鲁迅指教,也寄过两次翻译稿,请鲁迅审阅。诗稿中有一首较长的《进行曲》的续编,翻译稿中,一篇是从英文译出的俄国冈察罗夫的《阿波罗莫夫》的前五章,另一篇是从日文译出的一个德国反对希特勒法西斯统治的剧本《谈话教授》(后有人翻译出版题为《马门教授》)。鲁迅给了回信,这就是《鲁迅书信集》中《致蔡斐君》一信中所说的“阅看创作或校对翻译”所指的内容。

持之以恒的鲁迅研究者

鲁迅给蔡健的几次书信,第一封,是鲁迅先生逝世后不久,许广平写信给蔡健征集鲁迅遗书时,蔡健选择寄去的一封信,也就是至今尚保存了的这封信,并保存了信的原手迹;《鲁迅书信集》中的第二封信(致蔡斐君)是鲁迅先生病中写好后,由许广平手抄留下来的。而其他几封信,在抗战时期蔡健的流离生活中遗失了。蔡健为此曾夙夜终生。

受鲁迅的鼓舞,蔡健在后来从事教学的几十年中,长期对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对鲁迅进行了持之以恒的研究。他在湖南师范大学任教时,主编和执笔编写的教材《中国现代文艺斗争思想史纲》、《鲁迅作品选讲》等很受高校学术界重视。他系统研究鲁迅后,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论文,其成果已集结在《鲁迅道路试探》一书中。国内外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都赞扬这本书“是鲁迅研究的可喜收获”,“解决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,尤其是鲁迅研究中的重要问题”。

蔡健先生已于1995年9月20日逝世,悼词说“蔡先生是当之无愧的鲁迅研究专家,是与鲁迅有过直接接触的为数不多的几个研究鲁迅的著名学者之一”,端是确论。

题写“株洲日报”“株洲晚报”的那些事儿

马立明

我作为一个酷爱书画艺术,且又在《株洲日报》工作长达三十年的老记者、老编辑,经常会碰到一些人问:“你们的《株洲日报》和《株洲晚报》是谁题写的?”这两个“报头字”的原稿还留着吗?”对此,我略作如下回答。

郭沫若题写“株洲日报”报头

《株洲日报》作为株洲市委机关报,始创于1957年10月1日,报头字由时任株洲市委常务副书记任之同志题写。因为创刊时是《株洲报》,故隔日出一期。至这年的12月20日,株洲市第二届党代会召开,《株洲报》从这天起改为《株洲日报》,隔日报也就自然改为日刊了。“株洲日报”四字由当时号称“秀才”的、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唐麟同志题写。

至1959年7月,由于“庐山会议”风云突起,唐麟同志也因此受到牵连。他题写的“株洲日报”四字自然也不好用了。也就是从这年的10月1日起,株洲日报改由一个普通干部题写。

到了1963年的一个夏天,《工人日报》记者石本坚同志来株洲采访。他和陪同他一道采访的本报记者说:“你们的报纸办得还是不错,可惜报头字太差劲了,不成其体。为什么不换一个漂亮点的?”很快,石记者的意见反馈到社领导那里,大家琢磨着,说是一定要找个“名人书法”或是“书法名人”来题写。起初,他们想到了毛主席,认为毛主席无论哪个方面都是最合适的人选。但是想来想去,觉得我们是张地方小报,不敢奢求。最后,大家把目光锁定在郭沫若同志身上。意见统一后,社里贸然给郭老写了一封诚挚渴求的信。不久,郭老回信了,他们小心翼翼地用剪刀剪开牛皮纸信封,果然,“株洲日报”四字赫然出现在一张不大的生宣纸上。

郭沫若同志的字,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算是写得较好的一个,特别是他六十年代以后的字,日趋走向成熟,风格更趋强烈、明显。你看“株洲日报”四字,明快奔放、风神洒脱、气贯笔端,而且平中寓奇、俯仰有姿、开合得当。

郭老题写的报头,自1963年9月5日正式起用至今(“文革”中有段时间未用外),已经65个年头了。

不幸的是,郭老题写的《株洲日报》四字,原件在“文革”中遗失了,本报在创刊三十周年时曾刊发广告:“如有幸已蒙某君收藏,本报当以厚金酬之。”遗憾的

是:“泥牛入海无消息”。

李铎题写“株洲晚报”报头

《株洲晚报》是2000年6月1日正式创刊。“株洲晚报”四字是由当时组建株洲晚报的一个领导同志和我北上京城,找时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、文联将军李铎先生题写的。

李铎先生,是我读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时的书法老师,加上他又是株洲籍人,故家乡有什么请他支持和题写字的,如株洲火车站的“株洲站”;空灵岸(杜甫诗:次空灵岸)摩崖石刻;以及“99炎帝杯国际书画大展”请他题签和出任评委主任等,他都欣然应允。这次《株洲日报》要办子报《株洲晚报》,社领导找到了我。

那是2000年的一个春天,我和我的同事如约而至李铎老师办公室——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。此时的李老师和他的老伴,早已在等候。当我们向他汇报了本报近期发展情况和远期规划时,李老师听了特别开心。他说,既然你们办晚报的条件已经成熟,那就一定要办好,办出特色,不辜负人民的期望。他边讲边走向那个极大的书桌。我们看到:题字的纸早已裁好,镊子压着;砚台里的墨也已倒上,多枝毛笔整齐有序地摆放在笔架上。这时的他,取出一管羊毫,顷刻,“株洲晚报”四字一气呵成。我当时还傻想,李老会不会多写几张再来挑选一下呢?结果,他把眼光扫视了一下字面,说:“行了。”到底是书法大家,如果是没有几把斧头的人,恐难一次写好。

李铎老师的字,古拙沉雄,苍劲有力、雍容大度而又极见功力,仔细看“株洲晚报”四字,于平淡中极具书写的俊美,于端庄中极具气度不凡。可以说,字字雄强健挺,个个落落大方。李老师的字,其书法艺术风格,用笔与结构,多与郭沫若先生一脉相承。因为,李铎老师年轻时极崇拜郭老的书法。有一段时间,他研习郭老的字几乎成瘾。一次,一位朋友将他临习郭沫若书毛主席诗词27首呈给郭老看,郭老顿时盛赞:“哟,真还后继有人呢!”

如今,《株洲晚报》本着“为百姓说话,为市民服务”的宗旨,已成为市民一张不可或缺的报纸。我每次去京,也会带上一叠晚报请李铎老师审阅。李老师接过报也会开心地看,然后褒奖地说:“不错、不错,很有服务市民意识,很有地方报纸特色……”



陈浩望同志存照
蔡健书赠

株洲日报
株洲晚报

▲郭沫若题

▲李铎题